

政府信任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对 China Survey 2008 数据的双层线性回归分析

吕书鹏 朱正威*

【摘要】已有的研究认为个人对政府的信任主要取决于其自身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但是通过构建分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个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除了受到上述自身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个人所在地的区域性因素的影响。具体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弱、信息越发达，则当地的个体可能越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如果把上述静态观察纳入动态视角，那么在有效的政策措施出台前，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调低自己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关键词】 政治信任 区域因素 分层次线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15) 02 - 0125 - 21

一、问题的提出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历来是公共舆论领域的核心问题 (Chanley et al., 2000)。一般认为政府信任与政治参与、公共舆论、选举行为、公民顺从、社会信任等有着紧密的联系 (Aberbach, 1969; 梁莹, 2011a, 2011b; Muller, 1977; Muller et al., 1982; Seligson, 1980; 余敏江、梁莹, 2008)。从宏观上看，对政府的不信任可能引发上访活动、集体抗议、示威游行、群体性骚乱、不合作主义、集体罢工、联合抵制、社会紊乱甚至反政治系统等群体性行为

* 吕书鹏，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朱正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差序政府信任：现状、成因及影响” (2014M561610)。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李连江教授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肖唐镖教授对研究的资助和指导。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 论文

(Aberbach & Walker, 1970; Abravanel & Busch, 1975; Nilson & Nilson, 1980; Paige, 1971; 于建嵘, 2010)。而从个人层面上看, 公民对政治家和政府可信度的评价会影响他们: 是否会成为政治活动积极分子、是否会参与投票、是否支持政策与机构改革、是否与政治权威合作和是否信任其他人 (Levi & Stoker, 2000)。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者们普遍认为个人对政府的信任主要取决于其自身因素, 如性别、年龄、种族、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 (Feldman, 1983; Hetherington, 1998; Johnson, 2005; Kinder, 1981; Lawrence, 1997)。若事实果真如此, 那么在控制了个人因素的情况下, 区域间个体对同一个中央政府的信任就不应该出现显著的差异。原因有三: 一是几乎所有基于问卷的实证研究均显示, 我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整体上处于高位 (如历届的 Asian Barometer、World Value Survey、China Survey 等), 给地区间政府信任的波动留下的空间很小 (Li, 2004; 肖唐镖、王欣, 2010, 2012; 马得勇, 2007; Shi, 2001); 二是老百姓似乎不愿意把地方上的问题归咎于中央, 而是仅仅算到了地方政府的头上, 这种想法使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起来 (管玥, 2012; 吕书鹏、肖唐镖, 2015; 谢秋山、许源源, 2012); 三是国人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而这种文化并不鼓励质疑中央的权威 (Pye, 1992; Shi, 2001), 这就进一步拉平了可能存在的对中央政府信任的波动。

但是通过对 China Survey 2008 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本研究发现现实与上述推断并不相符。^① 事实上该调查中 73 个县/区的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见图 1)。在图 1 中, 纵坐标为被调查的 73 个县/区, 横坐标为县/区内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平均信任水平, 最大值 4 为“非常信任”, 最小值 1 为“非常不信任”, 中间值为 2.5。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中央信任水平较高的县/区如: 新疆阿克苏库车县、湖北省仙桃市、湖北荆州市松滋市、安徽六安市金安区和安徽六安市寿县, 其信任水平在 3.64 至 3.94 之间。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水平较低的县/区有: 福建莆田市仙游县、广东广州市白云区、辽宁铁岭市铁岭县、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和广西南宁市宾阳县, 其信任水平在 2.63 至 2.83 之间。从最高的 3.94 到最低的 2.63, 足足相差 1.31 (从接近“非常信任”降至稍稍高于中间值)。如以县/区为因子对中央政府信任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则得表 1。

^① China Survey 2008 是一项由德州农工大学 (Texas A & M University) 人文学院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调查项目, 具体介绍见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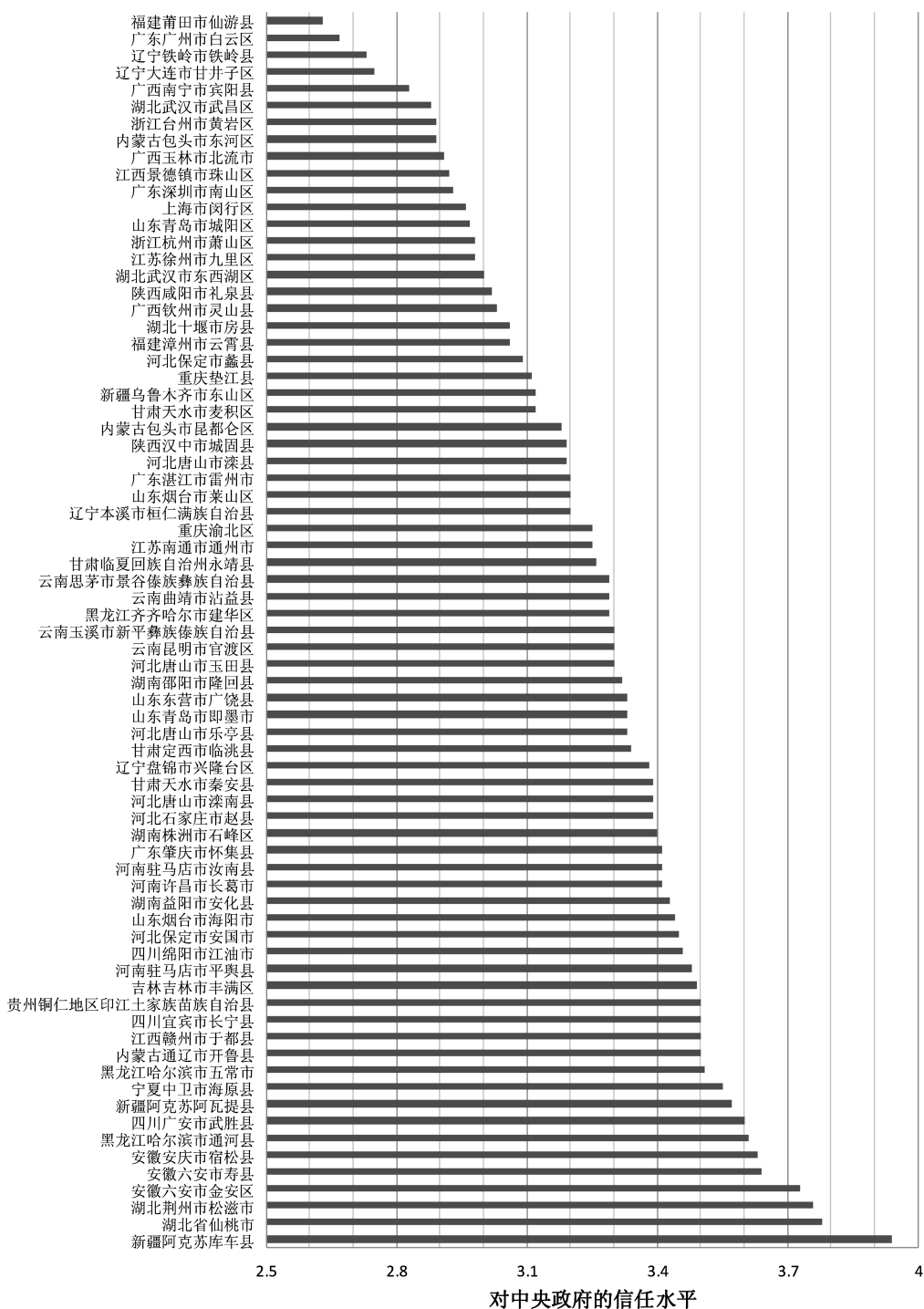


图1 各县/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平均信任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1 以县/区为单因素的中央政府信任方差分析

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方差和	自由度	均方	F
组间差异	216.768	72	3.011	5.345
组内差异	1 711.681	3 039	.563	
总数	1 928.450	3 11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表1中可以看出，图1中所描述的各县/区间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显著性水平为0.001。

为什么对同一个中央政府的信任会在区域间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在回答这一问题前需首先对已有研究中关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论述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具体如表2所示。

在表2中的后两类因素上，由于人们面临的是同样的国际环境、同样的国家领导人、同样的政党、同一个中央政府，如果他们获得的信息渠道是一样的，那么在控制个体因素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干扰后，政府和政治因素就不应该导致中央政府信任在区域间出现显著差异。因此，这里认为可能导致中央政府信任在地区间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表2中的前三类因素：经济、文化和信息因素。

表2 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已被实证研究验证的理论假设
经济因素	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越高，对于经济成长未来的预期越好，对于经济发展成果分配越满意则其越容易信任政府当局（Chanley et al., 2000; Citrin & Green, 1986; Citrin & Luks, 1998; Feldman, 1983; Kinder, 1981; Lawrence, 1997; Miller & Borrelli, 1991; Walker, 2006）。
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塑造政治信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东亚传统儒家文化鼓励人们尊重权威，而以美国政治文化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传统鼓励人们质疑当局的动机和能力（Chanley et al., 2000; Gabriel, 1995; Hart, 1978; 马得勇, 2007; Offe, 1999; Shi, 2001; Sztompka, 1999）。此外犬儒主义的流行（Mansbridge, 1997）、较低水平的社会资本（胡荣等, 2011; Jackman & Miller, 1998; 刘米娜、杜俊荣, 2013; Putnam, 1993, 1996; Rahn, 2000）、少数民族族群意识的兴起（Avery, 2006）也会导致政府信任的流失。
信息因素	①媒体风格上，对政府评价呈负面的媒体受众倾向于不相信政府（Bok, 1996; Lipset & Schneider, 1983; Miller et al., 1979; Nye & Zelikow, 1997; Orren, 1997）。②媒体角色方面，现代媒体生动的画面导致人们更容易记住政府的负面形象，从而导致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Moy & Scheufele, 2000; Nye, 1997）。③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通过降低社会资本和传播政府负面信息两方面降低政府信任（Putnam, 2000; Walker, 2006）。

(续上表)

影响因素	已被实证研究验证的理论假设
政治因素	①国际环境：当外部国际环境紧张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会得到加强（Levi & Stoker, 2000；Nye, 1997）。②领导人个人特征：领导人个人的形象与表现会直接影响到政府信任的变化（Citrin, 1974；Citrin & Green, 1986；Kinder, 1981）。③腐败与不诚信：政治生活中不断增加的腐败与不诚信是政府信任下降的原因（Anderson & Tverdova, 2003；Banducci & Karp, 1994；Bowler & Karp, 2004；Clarke et al., 1999；Lanoue & Headrick, 1994；McAllister, 2000）。④政党的角色：政党协调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能力的下降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的下降（King, 1997；Lipset & Schneider, 1983；Miller & Listhaug, 1990）。⑤政治互动：良性的政治互动可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Fair, 1994；Manion, 2006；Nye & Zelikow, 1997；Rosenstone, 1983），而不良的政治互动（如上访与抗争等）会导致政府信任的下降（Li, 2008；胡荣, 2007）。
政府因素	①政府管理范围：政府管理范围未能适应新工业革命赋予的新角色会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下降（May, 1997；Nye, 1997）。②政府绩效：民众对政府绩效和服务的评价与政府信任呈正比（Craig, 1993；Feldman, 1983；胡荣等, 2011；Johnson, 2005；倪星, 2006；芮国强、宋典, 2012；Stokes, 1962；Weitz - Shapiro, 2008；Williams, 1985；杨宏星、赵鼎新, 2013）。③公共政策：当人们感觉到政府的政策符合他自身的利益时，他就更倾向于相信政府（Hetherington, 1998；Miller, 1974a, 1974b；Miller & Borrelli, 199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研究假设

经济因素方面，在表2中已提到人们对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对经济成长的预期和对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满意度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评价。如果比较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会发现：首先，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发达地区居民对经济成长相对于欠发达地区有更高的期望，而现阶段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难达到这种期望；其次，在进入2000年（特别是2005年）后，由于产业转移等各种因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速普遍被欠发达地区超越，导致发达地区居民的经济状况改善速度落后于欠发达地区；第三，发达地区的贫富分化较欠发达地区更为严重，而这一情况又被近年来高涨的房价不断放大，导致发达地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较欠发达地区居民更为强烈。据此从经济因素方面推测，经济发达地区居民较之欠发达地区居民可能更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

文化因素方面，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政治与社会文化通过以下三点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一是鼓励人们保持对权威的认同甚至崇拜，将官员与自己的

关系定义为一种等级关系而不是互惠关系 (Shi, 2001; Walder, 1986), 崇拜官员的权力而忽视政府回应百姓诉求的义务 (Pye, 1992; Shi, 2001); 二是重视个人社会责任, 轻视个人利益, 强调当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个人有牺牲自身利益的义务 (Bond, 1991; Tang, 2005); 三是仅仅反对“残暴”专制, 而不反对“开明”专制, 或者说不反对“专制”本身。此外新传统文化强调“伟大领袖”可以通过“发动人民群众”以“运动”的形式有效地惩治腐败 (O'Brien & Li, 1999)。这有助于鼓励人们将清廉的中央领导与腐败的地方干部区分开来 (Li, 2004; 李连江, 2012), 从而维持其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物质需求的充分满足催生出更高层次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Inglehart, 1990, 1997), 传统政治文化在一些地区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 这导致其维系人们的政府信任时显得越来越乏力。此外在一部分地区, 正兴起一种“现代犬儒主义”,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民众将许多不良社会现象或问题 (不管是否应该与政治挂钩) 都放入到一种对政府的嬉笑怒骂中去。这种“愤世嫉俗”的民间思潮, 一方面可能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将愤怒转向政府; 另一方面, 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政府很难通过改进绩效来重新获得民众的信任, 因为人们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标准本身也受到了该思潮的影响 (Mansbridge, 1997)。据此从社会文化因素方面推测, 传统文化因素与新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不断弱化的地区居民较之两者影响仍然很强的地区居民可能更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

信息因素方面, 在传统媒体上, 一部分地区 (譬如东南沿海地区) 的媒体的表现较为进取, 其对社会问题的批评力度更大, 就这些问题对政府的评价也可能更为负面。相比之下, 另一部分地区的传统媒体 (譬如偏远地区) 对各种社会问题即使有批评也普遍较为温和, 且一般会更多地强调中央政府的正面作用。而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普及上, 地区之间同样存在较大差异。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居民可能更不愿意信任政府, 这是因为: 一方面, 互联网会显著减少社会资本, 从而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表现为经常上网的人可能变得更不容易相信他人 (Putnam, 2000; Uslaner, 2004); 另一方面, 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使政府很难控制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从而使人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关于政府的负面消息 (Walker, 2006)。因而从信息因素方面推测, 传统媒体的表现越进取、对社会问题的批评力度越大以及新媒体的普及率越高的地区居民可能越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

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弱、信息水平越发达, 则当地居民可能越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 反之则相

反。证明本研究假设的意义有两点：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解释政府信任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缺乏面板数据的情况下，通过宏观的静态观察预测我国政府信任未来可能的走向。虽然这里没有办法测度一个地区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信息发达程度的资料也无法直接获得，但幸运的是这两类因素与经济发达程度在多数情况下是高度重合的，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往往当地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弱、信息水平也越发达。因此只要通过数据分析证明，在个体因素被有效控制的模型中，经济发展水平与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可。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选取分层次线性回归模型作为数据分析工具。原因在于传统的 OLS 线性回归模型在分析多层数据时往往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以个体为研究单位，则无法测算出群组因素效应；如果以群组为研究单位，则无法控制个体因素对群组效应的干扰。以本研究为例，如果以个体为基本单位，以个体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为因变量，在传统的 OLS 线性回归模型中是无法测算出以县/区为单位的群组因素（如县/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因变量的影响的；而如果以县/区为基本单位，以县/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平均信任水平为因变量，则很难控制诸如个人的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水平等个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本研究使用的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一）数据介绍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由两个层次组成：

第一个层次以公民个体为单位，数据来自 China Survey 2008。这是一项由德州农工大学人文学院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调查项目。数据的采集时间为 2008 年 4 月 6 日至 6 月 7 日；样本为 18 岁以上的中国公民；采集方式是面对面的访谈，每人耗时 80 分钟。抽样方式采取分层抽样，首先在 GPS/GIS 技术的辅助下从官方的七大区域中抽取 75 个县/区（最终实际抽取的是 73 个县/区），再从每个县/区中随机抽取两个乡镇一个街道，进一步再通过 GPS/GIS 技术从每个镇/街道抽取 25 个村/社区，每个村/社区抽一个人进行访谈。^①

^① GPS/GIS 辅助抽样技术由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耶鲁大学皮埃尔·兰德里（Pierre Landry）教授共同研发，该技术旨在减少基于列表偏好产生的误差。

◆ 论文

调查的结果共采集到 3989 个个体样本，平均每个县为 55 个。虽然在数量上较为有限，但考虑到使用了较为科学的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这里认为这些样本的平均值在县/区层次上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表 3 样本构成情况

项目		频数	有效%
性别	男	1 924	48.2
	女	2 065	51.8
	有效合计	3 989	100.0
年龄	30 岁以下	712	17.8
	31—45 岁	1 421	35.6
	46—60 岁	1 104	27.7
	60 岁以上	752	18.9
	有效合计	3 989	100.0
	教育年限	6 年及以下（约相当于小学及以下）	1 235
7—9 年（约相当于小学至初中毕业）		1 176	37.5
10—12 年（约相当于初中至高中毕业）		470	15.0
13—16 年（约相当于高中至大学毕业）		234	7.5
17 年及以上（约相当于研究生及以上）		23	.7
有效合计		3 138	100.0
民族	汉族	3 408	87.4
	少数民族	492	12.6
	有效合计	3 900	100.0
所在地区	东北	438	11.0
	华北	730	18.3
	华东	555	13.9
	华南	338	8.5
	华中	848	21.3
	西北	435	10.9
	西南	541	13.6
	直辖市	104	2.6
	有效合计	3 989	100.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个层次以 China Survey 2008 的 73 个县/区为单位样本，数据一部份来自对 China Survey 的整理，一部份来自于各地的年鉴、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考虑到调研时间为 2008 年，故选择 2007 年的统计公报和 2008 年的年鉴数据（2008 年的年鉴记录的是 2007 年的统计数据）。以县/区为第二层次样本单位，主要是由于 China Survey 2008 的分类设置（只有省级和县级政府）导致研究在选取第二层单位时只能从县级或省级中二选一。考虑到 China Survey 的抽样方法和代表性问题，选择县/区作为第二层次样本单位要比省级更合适，故这里的第二层次样本单位选定为县/区，样本量为 73。

（二）变量选择

这里的因变量是个体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个体层面全部为控制变量（共 10 个），包括：是否可以接触网络、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对地方腐败状况的评价、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民族主义倾向、个体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年龄和性别。群组层次自变量包括：县/区经济发展水平、县/区到北京的距离、转移支付在县/区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城乡收入差异（农民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否为少数民族地区、县/区民众对县级政府的平均信任水平。其中县/区经济发展水平由当地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人均 GDP、低保水平、第一产业所占比例和每万人低保人数通过因子分析转化而得到。因子分析过程如表 4 所示。

表 4 县/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分析

提取因子与对应原始变量	因子负载	共同度
县/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909	.827
县/区第一产业占比例（%）	-.769	.591
县/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922	.850
县/区农民纯收入（元）	.908	.824
县/区低保水平（元）	.878	.771
县/区每万人低保人口（人）	-.582	.339

注：Kaiser - Meyer - Olkin 值 = 0.872；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sig. = 0.001；提取法为主成分分析，未旋转；特征值 = 4.202/6.000，解释变异 = 70.04%。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双层线性模型及分析结果

构建分层次线性模型一般要经过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通过方差分析检

测数据在群组层面上的变异程度，进而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分层次线性模型分析；第二步，将各变量放在个体层面上进行回归分析，确定在个体层面上各个变量是否显著影响个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可以选择删除或保留影响不显著的变量；第三步，筛选出在群组层面上变异明显的变量；第四步，构建分层次线性模型以群组变量解释上述变异。篇幅限制这里仅展示最终模型（方程组 1 和方程组 2）以及分析结果（表 5）。

Level - 1 Model（方程组 1）

$$CEN_{ij} = \beta_{0j} + \beta_{1j} \times (NET_{ij}) + \beta_{2j} \times (EDU_{ij}) + \beta_{3j} \times (SOS_{ij}) + \beta_{4j} \times (INCL_{ij}) + \beta_{5j} \times (SATIS_{ij}) + \beta_{6j} \times (CORRUP_{ij}) + \beta_{7j} \times (NATI_{ij}) + \beta_{8j} \times (COUI_{ij}) + \beta_{9j} \times (AGE_{ij}) + \beta_{10j} \times (GENDER_{ij}) + r_{ij}$$

Level - 2 Model(方程组 2)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 \times (COUC_j) + \gamma_{02} \times (ZYZ_j) + \gamma_{03} \times (DRID_j) + \gamma_{04} \times (MA_j) + \gamma_{05} \times (SU_j) + \gamma_{06} \times (ECON_j) + u_{0j}$$

$$\beta_{1j} = \gamma_{10}$$

$$\beta_{2j} = \gamma_{20}$$

$$\beta_{3j} = \gamma_{30} + \gamma_{31} \times (COUC_j) + \gamma_{32} \times (ZYZ_j) + \gamma_{33} \times (DRID_j) + \gamma_{34} \times (MA_j) + \gamma_{35} \times (SU_j) + \gamma_{36} \times (ECON_j) + u_{3j}$$

$$\beta_{4j} = \gamma_{40}$$

$$\beta_{5j} = \gamma_{50}$$

$$\beta_{6j} = \gamma_{60}$$

$$\beta_{7j} = \gamma_{70}$$

$$\beta_{8j} = \gamma_{80} + \gamma_{81} \times (COUC_j) + \gamma_{82} \times (ZYZ_j) + \gamma_{83} \times (DRID_j) + \gamma_{84} \times (MA_j) + \gamma_{85} \times (SU_j) + \gamma_{86} \times (ECON_j) + u_{8j}$$

$$\beta_{9j} = \gamma_{90}$$

$$\beta_{10j} = \gamma_{100}$$

其中 CEN 为个体对中央政府的信任；NET 为个体是否可以接触网络；EDU 为个体的受教育年限；SOS 为个体的社会地位；INCL 为个体收入水平在身边人中所处的地位；CORRUP 为个体对所在地区地方政府腐败程度的评判；COUI 为个体对所在地区县级政府的信任度；SATIS 为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NATI 为个体的民族主义倾向；AGE 为个体的年龄；GENDER 为个体的性别。COUC 为县/区民众对县级政府的平均信任；ZYZ 为转移支付在县/区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DRID 为县/区到北京的行车距离；MA 为是否为民族地区；SU 为城乡收入差异；ECON 为经济发展因子。

将数据带入上述模型得表 5。其中模型一为仅考虑个体因素情况下的 OLS 模型回归结果。模型二为与之对应的分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满意度”“是否接触网络”“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对地方官员腐败程度的评价”“(个体)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民族主义倾向”等个人因素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因子”和“所在县/区民众对县级政府的平均信任水平”两个区域变量对于个人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

其中“经济发展因子”一方面在控制了个人因素的情况下对中央政府信任有直接的显著负向影响;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信任和中央政府信任之间的斜率正相关。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强化个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与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之间的联系。由于在我国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要远低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因而强化两者的关系无异于间接拉低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综合两者,可以说研究假设得到了数据分析的支持。

四、讨论

如前文所述,经济发展水平与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有两组相关:一是直接负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与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二是间接负相关,通过干扰个体因素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具体说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个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之间的相关系数越大)。上述两组相关关系如图 2 所示。其中第一组相关关系的逻辑分析在前文研究假设部分已经提过:发达地区居民对经济绩效的期望往往更难被满足;发达地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较欠发达地区更为强烈;发达地区的传统文化不断弱化,而“现代犬儒主义”日渐流行;发达地区传统媒体表现较欠发达地区更为进取、对社会问题批评的力度更大,新媒体也更为普及。这些都可能削弱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而第二组相关关系在逻辑上说,在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和受控信息渠道的共同作用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倾向于将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独立起来(当然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方政府的过失或恶行不太会导致人们对中央政府信任的降低。而在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可能不再认为中央与地方是相互独立的,当人们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信心时,也会相应地减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表5 分层次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截距		截距	
	回归系数(标准误)	回归系数(标准误)	回归系数(标准误)	回归系数(标准误)
截距	1.751(.088)***	3.268(.023)***	/	/
是否使用网络(使用=1, 对照: 不使用=0)	-.120(.043)**	-.046(.040)	/	/
教育水平(年)	-.002(.005)	.006(.004)	/	/
社会地位(最低=0; 最高=10)	.022(.008)**	/	/	.019(.006)**
家庭相对收入(最低=0; 最高=10)	-.026(.008)***	-.018(.006)**	/	/
满意度(最不满意=0; 最满意=30)	.004(.002)†	.004(.002)*	/	/
对地方官员腐败程度评价(一点也不严重=1; 非常严重=4)	.029(.015)*	.027(.014)†	/	/
民族主义倾向(最弱=3; 最强烈=15)	.013(.005)*	.007(.005)	/	/
个人对县级政府的信任(非常不信任=1; 非常信任=4)	.425(.026)***	/	.442(.023)***	/
年龄(岁)	.002(.001)**	.003(.001)***	/	/
性别(男=1, 对照: 女=0)	.050(.023)*	.029(.022)	/	/
县/区民众对县级政府的平均信任(非常不信任=1; 非常信任=4)	/	.537(.091)***	.003(.102)	-.057(.024)*
县/区财政中转移支付所占的比例	/	.022(.178)	-.254(.175)	-.037(.045)
县/区到北京的距离(千公里)	/	.006(.023)	-.032(.029)	.009(.008)
县/区是否为少数民族地区(是=1, 对照: 否=0)	/	-.016(.055)	.043(.052)	-.034(.015)*
县/区农民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	.162(.173)	-.225(.147)	-.031(.036)
县/区经济发展因子	/	-.106(.037)**	.084(.036)*	.006(.010)

注: 第一层次 $n = 3989$, 第二层次 $n = 73$ 。因变量为个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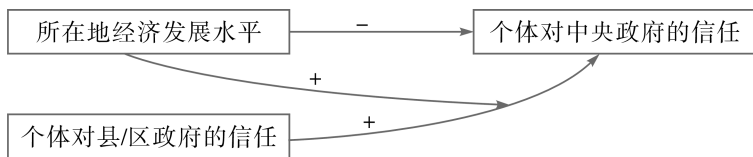


图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个体的政府信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带来文化和信息因素的变革，还可能会透过影响其他因素与政府信任之间的逻辑关系，间接削弱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譬如前文提到的：个人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和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会影响其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受到信息渠道的局限，欠发达地区居民主要接触的是官方对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宣传，因而可能倾向于给出较为正面的评价，这种评价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相比之下，由于受到官方媒体外的其他各种信息的影响，发达地区居民可能更关注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如食品安全、高涨的房价、通货膨胀、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等，其对政府在经济上的绩效给出的评价可能不会那么高。如果再考虑到文化因素，那么即使得到的关于政府绩效的信息是等量的，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发达地区居民可能并不愿意将自己所感知到的政府绩效全部转化为对中央政府合法性的认同。

类似的机制还可能发生在对腐败问题的评价上。欠发达地区居民所能接触到的腐败信息一般来自传统媒体，如电视和报纸。这类信息有如下特点：一是被专业的编辑处理过；二是多在官员下马以后才被报导，有滞后性；三是被公开的腐败官员级别普遍比较低，一般不高于厅级干部，极少有省部级干部。这类信息正常情况下不会导致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至多会导致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相比之下在发达地区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关于腐败的信息要更令人印象深刻一些：一是人们能够接触到一些未被处理过的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腐败信息；二是发达地区的所谓“消息灵通人士”可能在官员未被处理之前，或正在处理过程中（如被“双规”期间）就能听到一些“风声”，并将这些信息传播出去；三是发达地区居民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一些无法证实的高层领导的腐败信息或谣言。长期处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可能会导致个体产生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如果考虑到文化因素，那么即使得到的关于政府腐败的信息是等量的，受传统政治思想影响较深的欠发达地区居民对腐败的容忍度也可能

要比发达地区居民更高一些。^① 也就是说“腐败”与“不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欠发达地区可能要比发达地区更弱一些。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论断：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弱、信息越发达，则当地的个体可能越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其原因可能三个方面：在经济因素方面，发达地区较欠发达地区经济期望更难被满足，经济状况增速更为缓慢，贫富差距导致的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在文化因素方面，发达地区较欠发达地区，倡导信任并崇拜权威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新传统政治文化已渐式微，而鼓励质疑甚至蔑视权威的“现代犬儒主义”逐渐流行；在信息因素方面，发达地区较欠发达地区，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兴媒体上，政府在控制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时都显得更加困难，此外新兴媒体还通过减少社会信任间接地减少人们的政治信任。

如果将这种静态观察纳入动态视角，即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看作我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那么在建国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主要得益于受控的信息系统和政府主导的政治文化共同形成的“单向阀门”（只允许流入，不允许流失），这一“阀门”将政府信任“堵”在一个异常的高位。但是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逐渐动摇，信息传播也变得更为自由、便捷。这就相当于缓慢地拉开了上述维持高政治信任水平的“阀门”，使得高企的政府信任逐渐向应有的水平“回落”。由于这种“回落”需要一个“先地方、后中央”的过程，这就出现了许多研究所观察到的“差序政府信任”（管玥，2012；李连江，2012；吕书鹏、肖唐鏢，2015）。而从本文所估算的趋势来看，民众的政府信任在经历了一个由“中央高，地方高”变为“中央高、地方低”的过程之后，还可能进一步向“中央低、地方更低”转变。当大部份中国人的政府信任变为“中央低、地方更低”时，较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将无法避免，因为现行体制很难在低政治信任水平下运行。具体表现在，随着人们对中央越来越失去信心，政府将面临合法性受到侵

^① 如河南省XX县的一位农民就指出：“即使中央领导真的是腐败的，也不影响我对他们的信任。因为人家虽然可能拿钱了，但是人家制定的政策确实是为了老百姓好。下面当官的贪腐了，只要一曝光，人家肯定也会收拾下面这些人。就冲这两点人家拿点儿钱也没啥大不了，都是人嘛，到那个高位上，这点小事儿，根本就不算啥。”（调研时间为2011年8月）

蚀、绩效成本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好在留给执政当局的时间尚算充裕，虽然我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有下降趋势，但总体来看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享有的政治信任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吕书鹏，2015；马得勇，2007）。执政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各种教育和宣传手段，延缓政府信任的降低；另一方面可以稳步扎实、小步快走地探索和推进政治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政治系统驾驭低水平政治信任的能力。

附录：回归分析中变量的描述统计

问卷题目及编码方式	均值	标准差
请问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以下人员？中央政府官员。1 = 一点也不信任；2 = 不太信任；3 = 有点儿信任；4 = 非常信任。	3.288	0.787
请问您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以下人员？县级政府官员。1 = 一点也不信任；2 = 不太信任；3 = 有点儿信任；4 = 非常信任。	2.724	0.840
请问您是否使用互联网？1 = 使用；0 = 不使用。	0.121	0.326
请问您受过多少年正规教育？	7.886	3.407
如果0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请问您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打几分？	4.768	2.055
如果0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请问您的家庭收入在您所在的县/市/区可以打几分？	4.320	2.036
如果0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请问您对自己的家庭收入的满意度是多少分？(h2a)	5.020	2.676
如果0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请问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多少分？(h2b)	5.912	2.563
如果0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请问您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是多少分？(h2c)	5.238	2.687
满意度量表 = h2a + h2b + h2c	16.025	6.875
最近有许多关于腐败问题的讨论。青年问您认为地方政府干部的腐败问题是否严重？1 = 一点也不严重；2 = 有点严重；3 = 不太严重；4 = 一点儿也不严重。	2.863	0.777
为了保护本国经济，中国应该限制国外商品的进口。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太同意；3 =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4 = 比较同意；5 = 非常同意。(d31a)	3.124	1.177
中国的电视应该优先播放国产电影和频道。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太同意；3 =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4 = 比较同意；5 = 非常同意。(d31b)	3.776	1.043

◆ 论文

(续上表)

问卷题目及编码方式	均值	标准差
进口电影、音乐和书籍正在损害我们的文化。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太同意；3 =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4 = 比较同意；5 = 非常同意。(d31c)	3.130	1.169
民族主义倾向量表 = d31a + d31b + d31c	10.018	2.258
请问您今年多少岁?	45.986	15.633
请访员观察受访者的性别。(男 = 1; 女 = 0)	0.482	0.500
县/区民众对县级政府的平均信任(1 = 一点也不信任; 4 = 非常信任)	2.712	0.261
县/区财力性转移支付在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	0.368	0.203
县/区到北京的距离(千公里)	1.478	0.884
县/区是否为少数民族地区(是 = 1; 否 = 0)	0.205	0.407
县/区经济发展因子	0.000	1.000

参考文献

- 管玥(2012). 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解释: 一项基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5(2): 67-99.
- 胡荣(2007).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社会学研究, 3: 39-55.
- 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社会学研究, 1: 96-117.
- 李连江(2012). 差序政府信任. 二十一世纪, 131: 108-114.
- 梁莹(2011a). 基层政府信任与城乡社区居民的选举参与. 中国行政管理, 10: 57-62.
- 梁莹(2011b). 街道乡镇政府信任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基于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28-35.
- 刘米娜、杜俊荣(2013).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 2: 64-74.
- 吕书鹏(2015). 差序政府信任: 概念、现状及成因——基于三次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学海, 4(待刊稿).
- 吕书鹏、肖唐鏢(2015). 政府评价层级差异与差序政府信任——基于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1: 29-38.
- 马得勇(2007). 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5: 79-86.
- 倪星(2006). 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81-87.

- 芮国强、宋典(2012). 政府服务质量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 9: 192 - 201.
- 肖唐鏊、王欣(2010). 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 对五省份 60 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 管理世界, 9: 88 - 94.
- 肖唐鏊、王欣(2012). 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政治效应分析——对五省、市 60 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 社会科学研究, 3: 43 - 49.
- 谢秋山、许源源(2012).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定量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 4: 12 - 20.
- 杨宏星、赵鼎新(2013). 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 学海, 3: 16 - 32.
- 于建嵘(2010). 抗争性政治: 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余敏江、梁莹(2008). 政府信任与公民参与意识内在关联的实证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中国行政管理, 8: 121 - 125.
- Aberbach, J. D. (1969).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1): 86 - 99.
- Aberbach, J. D. & Walker, J. L. (1970). Political Trust and Racial Ide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4): 1199 - 1219.
- Abравanel, M. D. & Busch, R. J. (1975). Political Competence,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Action Orienta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Politics*, 37(1): 57 - 82.
- Anderson, C. J. & Tverdova, Y. V. (2003). Corruption, Political Allegiances, and Attitudes Toward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1): 91 - 109.
- Avery, J. M. (2006).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Mistrust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4(5): 653 - 682.
- Banducci, S. A. & Karp, J. A. (1994).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Scandal and Reapportionment in the 1992 House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22(1): 3 - 26.
- Bok, D. (1996). *The State of N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nd, M. H. (1991). *Beyond the Chinese Face: Insights from Psycholog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wler, S. & Karp, J. A. (2004). Politicians, Scandal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Political Behavior*, 26(3): 271 - 287.
- Chanley, V. A., Rudolph, T. J. & Rahn, W. M. (2000).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a time series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3): 239 - 256.
- Citrin, J. (1974). Comment: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3): 973 - 988.
- Citrin, J. & Green, D. P. (1986).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Resurge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4): 431 - 453.

◆ 论文

- Citrin, J. & Luks, S. (1998). *Political Trust Revisited;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8 Hendricks Symposium on Public Dis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Lincoln.
- Clarke, H. D. , Feigert, F. B. , Seldon, B. J. & Stewart, M. C. (1999). More Time with My Money: Leaving the House and Going Home in 1992 and 1994.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2(1): 67 – 85.
- Craig, S. C. (1993). *The Malevolent Leaders: Popular Discontent in Americ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Fair, R. C. (1994). *Testing Macroeconometric Model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eldman, S. (1983). The Measure and Meaning of Trust in Government. *Political Methodology*, 9(3): 341 – 354.
- Gabriel, O. W. (1995).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 In Deth, J. W. V. & Scarbrough, E. Eds. *The Impact of Value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t, V. (1978). *Distrust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Trust in Britain and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therington, M.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 791 – 808.
-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ckman, R. W. & Miller, R. A.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47 – 73.
- Johnson, I. (2005). Political Trust in Societies under Transform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and and Ukra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35(2): 63 – 84.
- Kinder, D. R. (1981). Presidents, Prosperity, and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1): 1 – 21.
- King, D. C. (1997).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arties and Mistrust of Government. In Nye, J. S. , Zelikow, P. D. & King, D. C.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noue, D. J. & Headrick, B. (1994). Prime Ministers, Parties, and the Public: The Dynamics of Government Popularity in Great Brita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8(2): 191 – 209.
- Lawrence, R. Z. (1997). Is It really the Economy, Stupid? In Nye, J. S. , Zelikow, P. D. & King, D. C.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vi, M. & Stoker, L. (2000).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475 – 508.
- Li, L. (2004).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2): 228 – 258.
- Li, L. (2008). Political Trust and Petitioning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omparative Politics*, 40(2): 209 – 226.
- Lipset, S. M. & Schneider, W. G. (1983). 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8(3): 379 – 402.
- Manion, M. (2006). Democracy, Community, Trust: The Impact of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3): 301 – 324.
- Mansbridge, J. (1997). Social and Cultural Causes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U. S. Government. In Nye, J. S., Zelikow, P. D. & King, D. C.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y, E. R. (1997). The Evolving Scope of Government. In Nye, J. S., Zelikow, P. D. & King, D. C.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cAllister, I. (2000). Keeping Them Honest: Public and Elite Perception of Ethical Conduct among Australian legislators. *Political Studies*, 48(1): 22 – 37.
- Miller, A. H. (1974a).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1964 – 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3): 951 – 972.
- Miller, A. H. (1974b). Rejoinder to “comment” by Jack Citrin: Political Discontent or Ritu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3): 989 – 1001.
- Miller, A. H. & Borrelli, S. A. (1991).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During the 1980s.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9(2): 147 – 173.
- Miller, A. H., Goldenberg, E. & Erbring, L. (1979). Type – set Politics: Impact of Newspapers on Public Confid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1): 67 – 84.
- Miller, A. H. & Listhaug, O. (1990).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 Comparison of Norway,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3): 357 – 386.
- Moy, P. & Scheufele, D. (2000).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Trust.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4): 744 – 759.
- Muller, E. N. (1977).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Political Suppor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2): 454 – 467.
- Muller, E. N., Jukam, T. O. & Seligson, M. A. (1982). Diffuse Political Support and Antisystem Political Behavio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2): 240 – 264.
- Nilson, D. & Nilson, L. B. (1980). Trust in Elites and Protest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 论文

- Political Behavior*, 2(4): 385 – 404.
- Nye, J. S. Jr. (1997). Introduction: 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In Nye, J. S. , Zelikow, P. D. & King, D. C.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ye, J. S. & Zelikow, P. D. (1997). Conclusion: Reflections, Conjectures, and Puzzles. In Nye, J. S. , Zelikow, P. D. & King, D. C.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K. J. & Li, L. (1999). Campaign Nostalgia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sian Survey*, 39(3): 375 – 393.
- Offe, C. (1999). How Can We Trust Our Fellow Citizens?. In Warren, M. E. Ed. *Democracy and Tru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ren, G. (1997). Fall from Grace: The Public's Loss of Faith in Government. In Nye, J. S. , Zelikow, P. D. & King, D. C.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ige, J. (1971).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Rio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5): 810 – 820.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1996).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ivic America. *The American Prospect*, 24: 34 – 48.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Pye, L. W. (1992).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hn, W. M. (2000). Affect as Information. The Role of Public Mood in Political Reasoning. In Lupia, A. , McCubbins, M. D. & Popkin, S. L. Eds. *Elements of Reason. Cognition, Choice, and Bounds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stone, S. (1983). *Forecast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ligson, M. A. (1980). Trust, Efficacy and Mod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Study of Costa Rican Farmer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0(1): 75 – 98.
- Shi, T.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4): 401 – 419.
- Stokes, D. E. (1962). Popular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In Cleveland, H. & Lasswell, H. D. Eds. *Ethics and Bigness: Scientific, Academic,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Sztompka, P. (1999). *Tru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ng, W. (2005).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 University Press.
- Uslaner, E. M. (2004). Trust,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Interne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2): 223 – 242.
- Walder, A. G. (1986). *Communist Neo – 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ker, K. L. (2006). Gangster Capitalism and Peasant Protest in China: The last Twenty Year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3(1): 1 – 33.
- Weitz – Shapiro, R. (2008). The Local Connection: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 Argent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3): 285 – 308.
- Williams, J. T. (1985). Systemic Influences of Political Trust: The Importance of Perceive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Political Methodology*, 11(1/2): 125 – 142.

责任编辑：刘军强